“坦荡荡”难道不是官员应有的生活常识

□ 龙之朱

“我如果坐个几年牢，接受几年的改造，出来之后我就坦荡荡了。”这两天，浙江一名落马贪官的这句话刷屏了。

8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浙江省丽水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钟建安的忏悔视频。2019年9月，钟建安主动投案。经查，钟建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8万余元。2020年4月17日，钟建安被判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贪官多忏悔。之前不少贪官在忏悔时往往会抱怨同事和下属没有及时提醒他，称如果当时有人批评他，或者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的话，他也不会在违法违纪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还有的贪官则直白地表达了对平静生活的向往。我当然相信这些贪官彼时忏悔的真实性。际遇的变化，确实会对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产生强烈刺激。

不过，与这些贪官相比，钟建安的忏悔显然更实在，也更能让人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共情。不管是什么人，理想的生活大概就是“坦荡荡”的样子，能不能“坦荡荡”，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投案前的钟建安，生活其实并不顺心如意。收受巨额财物，看上去似乎是富足了，但“因为自己内心的一种恐惧、一种害怕，一种对组织的内疚，对父母教育的一种内疚，自己身体性格脾气都变得很不好”“即使一辈子不被查到，随时都担心什么时候又被查到，这个几十年是非常难受的”。

钟建安的描述真实再现了贪官的内心挣扎，明明知道伸手会被捉，成天纠结于那只靴子何时落地，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紧张兮兮，夜半常常惊起兀坐……特别是随着反腐持续加压，贪官们很难再凭侥幸蒙混过关，次第落马的同僚更是加剧了其个人心理危机。当此之时，“说出来”反而像放下了一块石头一样，有说不出的轻松。

不过，贪官所谓的“坦荡荡”，更多着眼的是个体感受。从自我拯救的层面看，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仅止于此。毕竟，贪官此前的行为已经给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严重败坏了世道人心，仅仅坐几年牢就能洗刷一切了吗？

你如果是负责工程项目的，那么你的贪腐会不会造就豆腐渣工程？你如果是从事文教事业，那么你的受贿是不是又制造了华而不实的文化垃圾？依此类推，官员贪腐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绝不会因为他自己坐牢了就会彻底消失。贪官既然已经自首，走出了可贵的自救第一步，不妨多一些悔罪意识，真正从公共利益的层面认识自己的罪行。

任何一个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贪官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接受法律惩处以后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但还不能说“坦荡荡”、两不相欠了。你欠下人民的债务，不要认为自首了，被双开了，被判刑了，就交割清楚了。要知道，官位俸禄，本来就是人民的供养。必须认真反思，真诚悔罪，方能获得人民的原谅，也才有可能“坦荡荡”。

对脱贫攻坚虚浮作风露头就打

□ 梁修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脱贫攻坚最后冲刺阶段，有的地方赶“急活”，盲目拔高脱贫标准，用乡村振兴典型村的目标来要求扶贫干部；有的地方在脱贫验收压力下，资料表格填写占用了大量精力，脱贫攻坚决胜成了“资料决战”；还有少数一些地方为迎接脱贫验收，精准脱贫工作不精准、不扎实甚至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指标脱贫等。

脱贫攻坚虚浮作风，在个别一些地方并非收官之年才出现的现象，而是有其存在的气候、环境和土壤，其实质和根源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其实，虚浮作风既沉不下去，也瞒不住人，一露头就露馅，不仅贻误脱贫攻坚的战略机遇，而且影响脱贫攻坚实际成效，更埋下返贫的风险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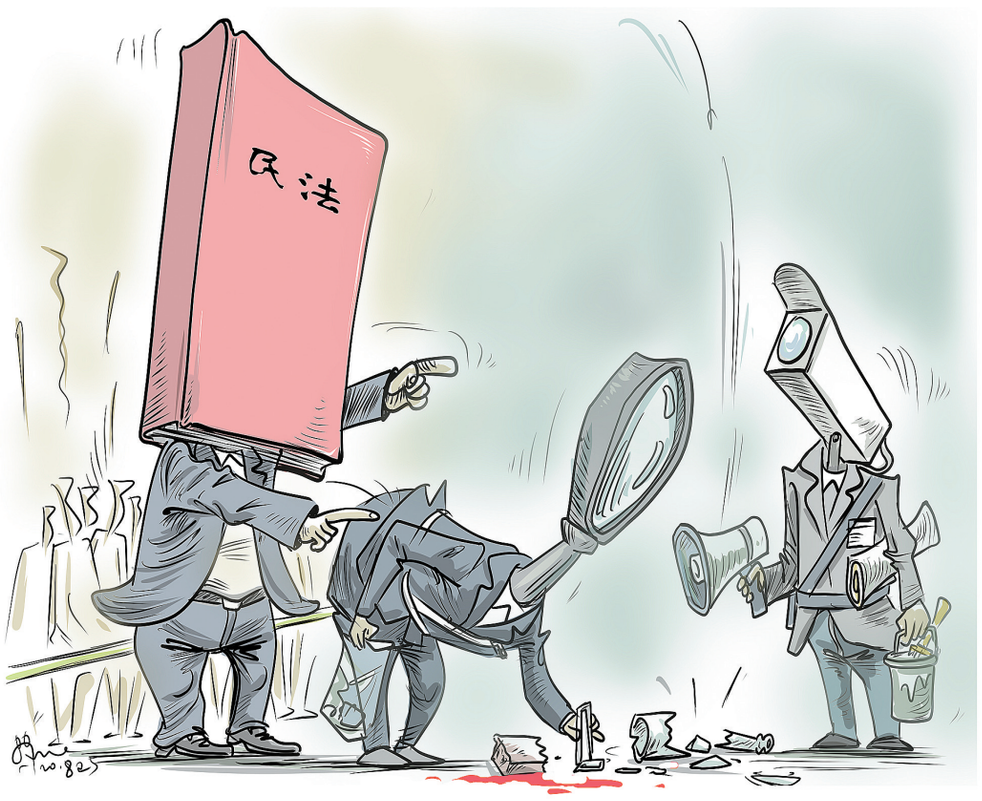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目前，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只剩52个贫困县尚未摘帽。当此之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收官硬仗，啃下这些“最难啃的硬骨头”，必须警惕虚浮作风，坚决克服盲目乐观、疲惫厌战思想和过关心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作风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全面精准施策。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队伍作风不仅体现党的形象，也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员干部的现实工作作风、思想认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直接关乎脱贫攻坚的成效，影响着全面小康的成色。“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打赢打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

打赢打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痛点、难点、堵点、热点等问题，聚焦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要求，聚焦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精准帮扶动态机制，聚焦建立健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切实“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按照“缺什么补什么”“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真正把政策记在心里、责任扛在肩上、工作落在实处。

精准施策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突出特点和基本方略，也是打赢打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招和制胜法宝。“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对象，其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破解的策略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因时、因势、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坠 落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越来越多，导致诸多无辜群众罹祸，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个别高空抛坠物事件面临找人难、取证难的难题，若直接责任人难寻，不少群众往往陷于对劣行严厉谴责又对“共同补偿”不理解的尴尬当中。民法典明确规定在发生高空抛坠物事件时，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光明日报》8月25日）

漫画：徐 简

为救人者卸下负担 别让“救不救”成为问题

□ 土土绒

近日，“男子发病两名医学生施救无效痛哭”引发社会关注。网络视频显示，湖南常德火车站内，两名年轻女生正跪地向一倒地男子进行心肺复苏与人工呼吸。不幸的是，该男子抢救无效离世，女孩们离开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不过，视频在网络热传的同时，竟然引来一些恶评。幸好，男子的家属第一时间向救人女生致谢，表示“虽然人走了，但必须要感恩”。女大学生所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也表示，两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医学生誓言，学校拟授予两人校长特别奖。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都是理解、赞扬两名女生的救人行为的，极少数杂音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切都让人备感温暖。但是，紧急情况之下救助他人，确实存在风险，见义勇为不能仅仅依靠社会的善意。

同样是抢救病人，2年多前的江苏南京，一名老人摔倒在地铁口，不省人事。热心路人和附近医院的医生护士合力将其送进医院，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急诊科主任果断决定实施手术“所有责任我来承担，救一条命总比害怕担责任要强。”手术非常成功，家属赶到后，也对医生表达了感谢。事件引来众多网友点赞，但过程中的风险还是让人捏一把汗。而且，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这样美好的结局。

就在同一天的辽宁锦州，120急救中心将一名病倒在公园的老年患者送至医院救治，患者经抢救清醒后，却反问医生“抢救我干啥”，家属赶到后也质疑医生“谁让你救了”。救治成功都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和不理解，那么，万一不成功呢？

救人从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会收获感激。社会是复杂的，每一次紧急情况也千差万别，充满了变量。2018年年底，福州小伙赵宇为了制止一男子对一女子的侵害，踹了男子一脚造成其内脏伤残，因此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幸好，在最高检的指导下，赵宇的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原不起诉决定书认定防卫过当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撤销。这一案例拓展了公民正当防卫的认定空间，弘扬了社会正气，成为鼓励见义勇为的标志性事件。

这两年，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我国在立法方面积极致力于用良法推动善治。民法总则在制定的过程中，三次修改有关见义勇为的规定，最终确立了俗称“好人法”条款的相关法条。在今年审议通过的民法典中，这些法律条款得到了继承和沿用。

例如，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民法典的高度鼓励见义勇为，尽最大可能为紧急救助者卸下责任和心理负担，法律规定既明确，又顺应民心。现实中，法律可能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紧急救助过程中，造成自己或他人损伤的后果如何担责，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而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判断的尺度，是千差万别的。

近日，湖南永州一17岁女生李爱（化名）在商场被一52岁男子用肘部袭击胸部，同行男同学胡林（化名）在控制袭胸男子时致其受伤，因此被永州冷水滩区公安分局予以刑事拘留。这几乎是另一个版本的“赵宇案”。李爱和胡林家属都认为，胡林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伤人担责，但目前，胡林仍然在看守所。这一案件最终会如何发展，结果尚难得知。

总而言之，要让人们抛下顾虑心无旁骛地救人，全社会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从社会观念上说，要对实施紧急救助者抱有足够的善意，无论救人的结果如何，救助过程是否误伤他人，对可能发生的意外要给予一定的宽容度。从司法机关来说，应该积极理解上位法精神，统一对救助行为的认定标准，以公正的司法实践推动公序良俗的建立，引导社会风气向善向好。

此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不妨积极发挥作用，除了及时给予“见义勇为”称号等精神奖励外，也可以建立奖励基金，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特别是在救助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很可能需要大笔医疗费用，格外需要社会的物质支持。这也是让人们勇于“出手”救助的一块必要拼图。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扶不扶”“救不救”不再是问题，消除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让社会充满浩然正气。

“蜗牛奖”让更多公职人员引以为戒

□ 黄 帅

日前，在浙江省缙云县2020年项目推进点评会上，有两家单位的负责人颇为尴尬。他们在县领导手中接过“蜗牛奖”，他们没有得到获奖者应有的掌声，因为这个奖并不是用于嘉奖工作出色者，而是用来警示和鞭策存在懒政怠政的单位。

其实，全国不只缙云县一个地方颁发过“蜗牛奖”。2018年4月，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工商局等3家单位，曾获得周村区首批“蜗牛奖”，一度引起了舆论关注与热议。而且，这已经是缙云县第四次颁发“蜗牛奖”了，获奖的单位，不仅得不到任何嘉奖，反而要在兄弟单位与民众面前“红脸出汗”，相关负责人还要被扣除综合考核分和月考核奖金。显然，任何人都不想要这样的“奖项”。

给后进者颁发“蜗牛奖”，既起到了监督与批评的作用，又不失幽默感，这类似于影视圈里的“金酸梅奖”，获奖者也能“出名”，只是这个名气并不光彩。而要摆脱这种负面形象，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需要更加努力与用心地工作，真正摆脱懒政怠政的问题。

从授奖过程上看，“蜗牛奖”还是比较公开公正的，并十分尊重真实的民意。2019年10月，缙云县就公布了《关于公开征集作风建设“蜗牛奖”问题线索的公告》，设置了缙云县作风建设“蜗牛奖”认定小组办公室，专门来应对此事，并确定了7种“获奖”的指标。这包括对县委、县政府重要决策部署推进不力，未如期实施或完成相关工作的情况，也包括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未及时处置，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总之，只要是违背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没能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做法，都有可能成为“获奖”的理由。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些公职人员存在较严重的懒政怠政问题。他们宁可让群众“多跑腿”，也不想让自己多受累，这显然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相违背。还有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对一些关切民生的工作任务不够积极主动，尤其是看到复杂问题时，心存畏难情绪或偷懒心理。这些行为的结果，往往就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人相互推诿责任，无法真正为民众排忧解难。

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效率，优化公共服务体验，是“蜗牛奖”的鞭策意义所在。让个别单位在民众面前“红脸出汗”，不只是为了监督与鞭策个别单位，更是为了让其他单位引以为戒。

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次获得“蜗牛奖”的单位，只要努力改进作风，下次就有可能评优评先，而那些缺乏自我鞭策意识与自我改革精神的单位，也有可能成为下次评选的“获奖者”。让整个干部队伍中出现踏实工作、力争上游与攻坚克难的良好气氛，才是“蜗牛奖”更深远的作用。

基层政府治理是一门大学问，如何用最合理高效的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每个干部都应审慎思考这个问题。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在用各种办法优化干部的工作作风，比如，浙江省发文鼓励“狮子型干部”，山东省要求重用“李云龙式的干部”。各地的做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当前，不少政府工作需要面对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需要一批肯干能干的干部，既符合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工作实现优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严禁挤占体育课”为何再次被强调

□ 夏熊飞

近日，教育部针对在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关于要保证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时间的提案做出回应，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央视新闻 8月24日）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并非新鲜提法。此次教育部再次作出回应，应是出于“新老问题”叠加的考量。

新问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教学秩序大受影响，很多低风险地区的学校在复学复课后依然“宁紧勿松”，为减少学生之间的接触与摘口罩的时间，往往会取消体育课和校园体育活动时间。此举的确有助于疫情防控，但在防控常态化下，对校内体育活动一禁了之，显然有懒政之嫌，与其说是为了学生健康，不如说是怕担责任。

要知道，已经宅家上网课较长时间的学生们，不仅视力受到影响，缺少体育活动，也导致他们的体质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如今返校需要补上的不只是课本知识，加强体育锻炼也是当务之急。因而，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作出“严禁挤占体育课”的强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老问题是体育课被其他所谓的“主科”挤占，缺乏体育运动成为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障碍。部分学校之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严禁挤占体育课”的相关规定置若罔闻，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想上体育课。学校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语数外等“主科”，是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心理在作祟。二是不敢上体育课。相比于学生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体育活动中，学生难免会磕磕碰碰，甚至出现意外事故。为了避免可能导致的纠纷与校方风险，有的学校则尽可能减少校内的体育活动。三是不会上体育课。专业体育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部分学校不敢大力开展校内体育活动。此外，部分学校专业体育场地、器材缺乏问题也较为突出，成为体育课、校内体育活动开展的制约因素。

此次教育部的回应，除了再次强调“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外，针对有学校不想、不敢、不会上体育课等原因，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如推进体育中考改革，改进体育考试内容和方式，科学确定考试范围，增加考试项目可选择性，等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让学校树立体育科目与其他“主科”同等重要的认知，而在加强师资配备、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方面，也有诸多配套措施跟进，亦为保障体育课和校内体育活动时间提供了有力支撑。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一个健康强健的体魄，学习生活都会成为无本之木，特别是在青少年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充足的体育课和校内体育活动时间则是基础与前提。只有“严禁挤占体育课”成为所有学校、老师的共识与自觉，青少年体育教育才可以说真正迎来了春天。

自由谈

从人设到CP：青年文化新周期与明星制度的迭代

□ 孙佳山

在过去的明星制度当中，每个国家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所谓的“国宝”级的明星。因为在当时，与角色相对应的就是演技。对于传统明星的认定，就是技术性地判断其业务能力的强弱。而到了今天，建立在青年文化新周期之上的新的明星制度，是以流量为特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与之相对应的人设概念开始出现。

人设到底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明星的业务范围扩大了，超越了传统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不是只有在影视作品中扮演角色才是工作状态。新的明星制度下的流量明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也必须保持特定的形象、趣味和人格等设定。而明星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垂直式结构，变成现在无限贴近的平行式结构。

在传统的明星制度中，受众并没有了解明星的日常渠道，对明星都是仰望姿态。这也导致受众对于传统明星的外在相貌、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文化也进入到了新的周期，特别是有了微博、直播、短视频等媒介平台，明星必须以特定的人设和粉丝保持日常性互动。如果不能适应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的媒介生态，则会被迅速淡忘和淘汰。

如今，明星的人设并不像过去的角色那样的局限，受众对明星人设有着明确的文娱消费诉求。这种要求几近无处不在。比如，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现象？就是因为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平台上，任何个体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明星维持人设的难度，在某些方面而言，要远大于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对于这种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的相关讨论，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因素一直被忽视——95后、00后的现实成长环境问题，已经非常接近西方式的“原子家庭”。简单来说，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独生子女”一代的直接后代，是新一代的“独生子女”，不仅没有直系的兄弟姐妹，连上一代“独生子女”唾手可得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不具备。因此，在95后、00后的成长环境中，并没有同龄人亲属陪伴成长，而且这种孤独感是大范围的群体性的代际经验。

这也就不难理解，如今年轻人在移动互联网的各个媒介平台上，都呈现出非常“抱团”姿态的原因。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了极为独特的文化经验。

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两种特殊性，一是代际经验的特殊性，另外一种是媒介经验的特殊性。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讨论在人设现象基础上所产生的CP文化，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CP文化最初来源于日本，主要指在动画、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粉丝自行将其中的角色配对为情侣，有时也泛指两个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CP文化解决了人设现象之后的进一步的文娱消费诉求和审美心理等代入感问题，相关文娱消费诉求和审美心理等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满足。以人设现象为方法，CP文化是更为多维的人设，CP文化也是人设的某些层面的极端化，所谓CP解绑失败和人设崩塌，则是同一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也就是说，在新的明星制度下，明星的形象变成了开源的文化娱乐产品，包括形象推广、公众传播都是由广大粉丝深度参与建构，从人设到CP都是由广大粉丝动态参与完成。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尤其是传统的角色之外的人设和CP文化，是新一代流量明星在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背后的新的明星制度中所必须面临的关键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自我认同感的同时，深度参与到流量明星的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他们的这种狂热也就极易被资本利用。为了迎合粉丝群体的这种心理需求和逻辑，在狗仔、媒体、经纪公司、职业粉丝等多方的合力下，大量流量明星的隐私遭到曝光和炒作，甚至连基本隐私权都被侵犯。而其中一部分缺乏理性、不成熟的粉丝群体，将原本正常的追星行为演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生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失控行为。一些流量明星在事实上，也正在被这种新的受众、新的文娱消费逻辑所绑架。

总之，青年文化已经进入到新的周期，明星制度也正在长周期性的迭代。显然，这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没有风雨的道路。要想合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